

新史学译丛



# 时间与他者

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

Time &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德] 约翰尼斯·费边 著

马健雄 林珠云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译丛



# 时间与他者

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

Time &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德] 约翰尼斯·费边 著

马健雄 林珠云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与他者：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德)约翰尼斯·费边著；马健雄，林珠云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新史学译丛)

ISBN 978-7-303-23216-1

I. ①时… II. ①约… ②马… ③林… III. ①人类学—研究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74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4733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 SHIJIAN YU TAZH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9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

策划编辑：宋旭景

责任编辑：梁宏宇

美术编辑：李向昕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云虎

责任印制：马 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新史学

观古今中西之变

## 序言：批判人类学之综合

约翰尼斯·费边所著的《时间与他者》(*Time and the Other*)初版于1983年，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间，这本书已经成为批判人类学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之一，并逐渐成为人类学的核心文献。不过就像其他遵循这一传统的经典文献(参见克利福德和马库斯，1986；马库斯和费彻尔，1986；克利福德，1988；罗萨多，1989)一样，《时间与他者》保持着理论上的关联性，延续了紧凑而激烈的论辩风格。很多赞誉都集中于指出它在人类学批评领域中的划时代意义，同时也有人理解为，按照它不容妥协的认识论态度，它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理论景观中一个固定的地标。本文从介绍本书的论点出发，引导我们置身于20世纪70至80年代批判人类学的文本情境，分析本书与费边早期作品的关系，最后简单回顾《时间与他者》的出版所激发的人类学的发展，以此作为本文的总结。

### 论 点

《时间与他者》是对英国、美国和法国人类学中时间的构成性功能



的历史性解说。相较于由文化所决定的现时性时间体系(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 1940; 布尔迪厄, 1977), 费边着眼于概念层面的批判, 追问的是时间的安排部署与使用之类的问题。这样,《时间与他者》既是从大尺度的人类学研究入手的元分析, 也是对其时间构成的实现方式的一种解构。

费边论点的发展受到了人类学学科内在矛盾的触动: 一方面, 人类学知识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由人类学家与其交流对象通过相互之间的主体性沟通而生产出来的; 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民族志表述中, 它又制度性地压制人类学观察中最初的对话性现实。在一种科学人类学的客观性话语中, “他者”从未成为文化交流的伙伴, 而是成为空间上, 更重要的是在时间有距离的群体。这样, 对于田野工作中互为主体性之范畴与人类学对他者的历时性降级, 费边将两者之间的矛盾定义为人类学文本中的“生殖分裂性时间方式”。他阐述说:

我相信在田野中的人类学家常常使用的时间概念, 与他们写在有关其发现的报告上的不同。而且, 我认为, 对时间角色的关键性分析成为田野实践中民族志知识产生的一个条件, 并可能成为批评性人类学话语总体上的出发点。

在《时间与他者》中, 对分裂性时间用法的质疑, 意味着整体上对人类学研究批判的开端。田野工作的互为主体性与民族志话语的修辞手法两者之间的矛盾, 促使费边将人类学理解为先天的政治性学

科——这一学科通过将研究对象的时间降级，同时也完成了对研究对象的降级性建构。费边将这一建构现象定义为“对同生性的抵赖”<sup>①</sup>。这个术语成为一种注释，解释了一种处境，即对他者实行距离化定位的等级体系压制了民族志学所面对的当代性和共时性。以此建立的时间性结构将人类学家与读者置于特权性时间框架之下，将他者驱逐到次要发展阶段上。这一处境最终以典型化的方式，通过本质化的时间性分类，诸如“原始”，来建立和区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

费边以同生性抵赖的术语来界定人类学的“异时论”。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有关他者的传统话语的意识形态，很快便产生出来，人类学的异时性取向出现，并成为学科的中心性问题。费边的《时间与他者》从这一前提出发，提炼出一份人类学异时性话语的批判性谱系，经过反思，又对它的衍生理论进行了辨析。

费边就西方科学话语中时间系统的功能展开综合性分析，在这样的语境中铺陈他对异时主义的批判。在《时间与他者》的第一章中，他回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至19世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犹太—基督教的时间概念世俗化的产生与转变的过程，而且，人类学作为一个自主性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就是对这一变化的说明。学科理论的演变——科学主义、信仰进步的启蒙思想以及隐藏的殖民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交汇——依次成为人类学异时论的发展导向。这样，当代“科学”的分类，像“未开化的”“野蛮的”和“文明的”表示历史发展的阶段。

---

<sup>①</sup> 费边使用“同生性”一词，旨在将一个德语概念“Gleichzeitigkeit”英语化，这是一个现象学的范畴，兼指同时代和同步/同时性。



设想一下全球性有关普遍进步的历史，这一异时性逻辑识别并建构了19世纪晚期“野蛮人”中的“幸存者”——那些文化发展处于古代状态中的居民。同时，人类学的异时主义建立了“文明的”西方作为总体上人类进步的顶点的论述，并以这样的论点来合法化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活动。

费边将人类学根本性的异时论视为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即便在20世纪的人类学中，反进化论理论范式已经逐步兴起，他仍将民族志对象被降格至另外的时间视为人类学研究中总体上的构成要素。在《时间与他者》的第二章中，费边通过对英美文化相对主义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具体分析，详述了这一主题。在这些批评性评介中（紧接着第四章中也有类似对符号人类的讨论），费边认为，对同生性的抵赖及民族志中的互为主体性，是人类学的构成性要素，人类学就是这样以创造全球性时间等级的方式获得了权威性。

费边主要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铺陈开这样的解构性解读和论证，他对表述方式的策略性和异时性话语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对于他者的表述方式，费边认为“民族志的呈现（‘以一般现在时来描述说明其他的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以及文本化地强制性排除人类学家自传性言语成为异时论的核心修辞形式。正如费边所示，民族志表述标引了一种对话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仅仅在人类学家与读者的交流互动中才能够被认知。在这样的对话中，人类学的对象依然被排除了，而这样的对话是在田野工作的互为主体性的时间里建构起来的。在这样的脉络下，费边认识到，作为一种修辞载体，民族志将他者具体化



为人类学家观察中的天生的、非个性化的对象。

就像民族志被其中所隐藏的政治目的所利用，科学文本对人类学家自传性声音的压制也成为建构异时性的一个部分。根据这样的关联，费边指出，人类学家出现在田野工作的现场中，无疑影响了民族志知识的生产本身，但这种在场却不被人类学文本认可。透过对看似未受影响的他者保持有距离的以及客体化的描述，人类学家放弃了批判性的自省，尽管这样的自省能够向他们传达现象学（因此是同时性的）对话的前提。

费边对异时性话语认识论基础的质疑，回归到对西方知识传统的梳理与分析。通过对拉米主义教育和黑格尔美学的精心阐释，他指出“视觉的修辞”享有一种科学主义人类学的特权，即它认可“听”与“说”的视觉化，不过却面临异时性的困境。他指出：

只要人类学呈现它的对象主要地如我们所见，只要民族志知识主要认知为观察和/或表征（就模型、象征体系之类而言），它可能就是执意要抵赖它的他者的同生性。

这样的语句最终表达了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中的政治取态。基于这一批判性的前提，他认为，与帝国主义统治之间的瓜葛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学是具有先天妥协性的学科。<sup>①</sup> 费边认为，异时性话语是西方

---

<sup>①</sup> 费边是这样说的：“从存在性经验及政治性出发，对人类学的批评始于人类的一部分被另外一部分统治和剥削的耻辱。”（费边，1983：x）

统治的手段，它再生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在这样的前提下，费边对人类学异时论的批判亦随之表现为一种公开的调停。他非常有效地将时间距离化中的各种因素加以区别——诸如将他者描述为“原始的”或者“传统的”，并使其成为(新)殖民工程系列计划中的一部分。

《时间与他者》抵制人类学研究中像这样暗藏政治风险的导向，费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倡导与异时论断绝关系，也正是他发现了这一传统人类学话语中的构成要素。这是一种对学术活动的政治性调整。通过与认识论基础和文本方法的决裂，这样的调整能够让人类学与它的对象建立起真正的同时间性和真实的对话性关系。

在第五章所勾画的辩证人类学纲要中，费边聚焦于社会实践的一面。他一边强调实践作为一种针对视觉异时性修辞(因此将之前所观察到的对象重新描述为人类学力图呈现的积极性伙伴)的认识论选择；同时，他还要求将实践的概念扩展到田野工作本身的民族志时刻。这样一来，他不仅阐述了对视田野工作为活跃的、互为主体性的批判性文本的反思(并且因此成为天然对话性的)，也为人类学自我与民族志他者之间概念的重塑扫清了障碍。

## 历史背景

在1983年出版之后，《时间与他者》即被视为一部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具有原创性并备受赞誉的著作(参见马库斯，1984：1023-1025；



汉森，1984：597；克利福德，1986：101-102；罗什，1988：119-124）。的确，费边的分析针对的是人类学的现时性、人类学家自传性声音受到的压制以及视觉的修辞，为批判人类学开启了新前景。但是将费边的批判性研究追溯到《时间与他者》出版那一年可能是错误的。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到1983年，费边已经大致解决了人类学知识中的时间向度与对话实效的问题。实际上，《时间与他者》中的许多核心议题在70年代费边完成的理论性文章中已经初见轮廓。从这些材料看，这本书的思想谱系在那时已经成型。

具体而言，对民族学异时论的初步分析首见于一篇于1972年发表的文章《他者如何死去——反思人类学中的死亡》（“How Others Die—Reflections of the Anthropology of Death”，费边，1972；参见费边，1991：xiii）。通过检讨有关死亡的人类学文献的机会，费边首先批判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对人类学对象的建构并将其工具化的过程中，总是未加反省地以过去时间的形式来呈现它。后来在《时间与他者》的分析中，费边更进一步地将这一倾向视为人类学中的进化论遗产。尽管在20世纪的人类学中，反对进化论的潮流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死亡的民族志却仍然将它的对象当作理解人类古代遗存的窗口：

对于死亡的“原始”反应，因而能够为说明人类早期历史上的平行性个别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不过更常见的是，我们会看到，经过努力寻找之后发现，对死亡的当代反应，尤其是那些非理性、

过度仪式化和视觉化的表现方式，就被当作“古老”的遗存形式。

(费边，1972：179)

最初，这是对现存人类学文献的批评，文章将人类学死亡研究的概念性进展整理成提纲，并作为结尾。在这些简洁的命题中，费边指出了建立基于沟通与实践的民族志真实性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之必要。

(费边，1972：186-188)

反之，提出的问题也回应了他对田野工作的批评反省以及对概念与方法的思考。1966年至1967年，费边在当时属于扎伊尔(今刚果)的沙巴地区从事有关“加玛家庭运动”的民族志研究，为写博士论文做准备。<sup>①</sup>当时帕森斯系统理论在他接受研究生训练的芝加哥大学影响非常大，费边觉得自己受到限制，对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学教条持排斥态度，并竭力寻找新的批判性认识论。这样，在具有开创性的《语言、历史与人类学》(“Languag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971b)一文中，费边发展了第一个构想作为替代性模型，这一文本后来成为《时间与他者》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基本立场(参见本书第五章结语)。

费边在《语言、历史与人类学》中的辨析直接针对“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人类科学哲学(1971b：3)。费边明言，这样的趋向也标志着无批判性和无反省的态度。一方面，从中衍生了可测试的假设，因之生成了抽象性的理论模型，从而产生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见解；另一方

---

<sup>①</sup> 费边于1969年以博士论文《魅力型领袖与文化变迁》(*Charisma and Cultural Change*)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后，论文修订出版(参见费边，1969；1971a)。



面，这样的知识同样与它的解释性价值和有分歧的数据整体相关联。<sup>①</sup>对费边而言，这样的方法基于某种天真的、前康德的形而上学，预言可以利用公式化、标准化的方法来发现客观真理（第3—4页）。特别在民族志田野工作的语境下，这样的科学操作模式隐含着深刻的问题，即它需要否定构成性的主观因素：

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在召唤一种有意识的禁欲主义隐忍，这是一种结果，即科学主义者不应该受到任何“主观性”牵连的制约，也不应受到常识性迫在眉睫的现象的影响。研究的客观性方法需要服从于某种“理论”，需要依据一套超越个别性逻辑规则进行选择的相关命题，在这样的理论中对有关外在世界的数据进行归纳。这样，研究者才能借助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手段达到其进取之目的。（第7页）

不过，这样的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要持续地压制批判性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承认民族志知识的生产是一种内在的交互过程，因而是一种完全依赖于文本脉络的活动。

这一问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此时费边正在“加玛家庭运动”的参加者中做田野调查。实证主义方法需要一种能把观察到的现象

---

<sup>①</sup> 这几年间，费边的态度从反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哲学转变为对实证主义的批评——费边对特定的实用主义导向转而持欣赏态度，这是他在这样的转变之后进行的反思。（费边，1991：xii）

组织起来的理论，尽管费边能够借用马克斯·韦伯的魅力型领导理论，不过他早注意到了在“加玛家庭运动”中实证主义民族志的内在困难。<sup>①</sup>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从信徒的族群与社会多样性入手（这样依据其特性来清晰界定群体才有可能），另一方面要从无预感的、不引人注意的宗教活动入手。可是，传统的集体性对象、确定的仪式、符号、政治和经济元素在这里都见不到，费边只能借助唯一的工具来获取民族志信息，即互为主体性的语言学沟通方法。（第22—26页）

完成毕业论文两年之后，费边在《语言、历史与人类学》中阐述了他创建有意识的认识论的努力，这是非实证主义的、沟通人类学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费边受到德国实证主义特别是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后来更以威廉·冯·洪堡的诠释学语言哲学为模型建立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交互主体性认识论。这样，语言人类学的共时性趋势再度启发了费边，特别是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研究“沟通民族志”的文章(参见海姆斯, 1964)。费边从中找到了一种交互主体性民族志的模式，这一模式说明了交互主体性的过程，而非提出一些规则或标准，并将其视为某一文化成员社会行为的关键。（费边, 1971b: 17）

在海姆斯的基础上，费边将自己的分析与认识论问题从交互主体

---

<sup>①</sup> “加玛家庭运动”由比利时传教士普拉西德·坦普斯(Placide Tempels)创立。坦普斯是《班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ou*, 1945)的作者，该书对非洲独立运动起到过重要作用。19世纪50年代，坦普斯开始以“班图哲学”(Bantu Philosophy)的名义为基督教传道，他的宣道在扎伊尔沙巴地区各大铜矿的产业工人当中被广泛接受。尽管他们并没有完全与天主教教堂决裂，但坦普斯的信众们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名为“加玛”。“加玛”在斯瓦西里语中意为“家庭”(参见费边, 1971b)。



性的客观性，延伸到以“民族志学者与他的对象”为中心的问题。他提出，人类学田野调查应该理解为总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沟通性行动。相应地，就理解“彼时—此时”之间的彻底隔断而言，民族志知识仅仅建立在互为主体的真实性基础之上。费边将这一认识论公式化地阐述为两大主题：

1. 在人类学调查中，客观性既不依赖于某种理论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也不依赖于特定的数据，而是基于人类“互为主体性”的基础。（第9页，对起源的强调）

2. “客观性”在人类学调查中是通过进入某种沟通互动的脉络中获得的，这就需要一种媒介来表现并建立其脉络：语言。（第12页，对起源的强调）

在《语言、历史与人类学》中，费边已经着手详述这种交互主体性人类学认识论的广泛影响（这成为《时间与他者》中批判的基础）。田野调查作为持续的、互为主体的沟通形式的概念，其中不仅包含一种真正的人类学对话模式，而且也包含自我反思的民族志实践理论之中的辩证因素：

以辩证的认识论来理解永远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很简单，知识建构首先意味着它是对学者涉入的沟通语境的基础性反应，调查中的现象从属于这样的沟通性语境。（第20页）

因而，一种辩证的人类学从不会自称其实证主义认识论在政治上如何地天真无邪。在“后”及“新殖民”的世界成为背景之前，人类学在政治行动上的表现相当成问题。这样的环境只能强化对辩证性概念的需求，亦即民族志应被视为交互主体性的实践。（第 27—28 页）

从《语言、历史与人类学》通往《时间与他者》的路径就是这样描绘出来的。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理论贡献，费边也对民族志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这些都成为《时间与他者》的主题（费边，1974；1975；1979）。自出版以来，这本书不时受到批评，人们认为它过于抽象而“非民族志”；不过，就它自身的历史脉络而言，它也是费边研究“加玛家庭运动”的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费边，1990a）。在最后的分析中，《时间与他者》作为辩证研究的一部分，其实始于《语言、历史与人类学》提出的理论。它不仅是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实践的需要，同时也示范了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 知识脉络

《时间与他者》并不仅仅是费边个人知识发展的结果。它也是人类学批判的产物及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标志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学科的改变与重塑。反之，这样一种批判人类学植根于 60 年代末以来它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独立运动、在越南爆发的新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都不免影响到这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表面上看，它不证自



明的对象是相对于西方自我的那个他者。在60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有关人类学的政治责任与伦理的争议不断升温，尤其针对这一学科赖以产生的殖民政权结构以及继续支撑着它的新殖民关系的历史脉络(参见高夫，1968；勒克莱尔，1972；阿萨德，1973；韦弗，1973)。这些讨论后来成为发表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和《美国人类学学会通讯》(*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上的系列文章。随后若干年，它们不仅见证了对“重新塑造”人类学的强烈呼吁(海姆斯，1972a)，而且沿着这样的路径，一批激进的期刊创刊了，如《批判人类学》(*Critical Anthropology*, 1970-1972)、《辩证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975ff.)和《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980ff.)。

然而，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尽管是就其实际各持己见，但它们也有共同的敌人：一种霸权人类学的研究假定和实践。这种研究自称从属于自由人文主义，立足于对非政治、无偏见的科学实证主义的信仰，其客观性是由保持距离的中立来保证的。在这种人类学中，构成性的分析工具是基本的相对主义概念，它宣称所有的文化表现就质而言是一样的。

这一立场支配了美国人类学的文化取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虽有例外，但法国的各类结构主义同样如此。人们对这一立场的批评多是从科学性和政治性的视角出发的。近期值得关注的有关科学史与哲学的讨论，特别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范式的议题(库恩，1962)、鲍勃·斯科尔特(Bob Scholte)的批